

第 一 章

“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之诞生

1925 年 10 月 7 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国民政府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 26 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中山大学成立。

事实上，无论是“中山大学”还是“莫斯科中山大学”，都只是这所建立于莫斯科的新学校的简称，而它的本名和全称应是“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

苏俄为什么要在莫斯科建立一所以孙中山的名字为名称的大学呢？

其中的详细原因，说来话长，因此，在这里只能略作简要的叙述。

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在 1917 年，俄国爆发了划时代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改写了世界历史。这件事，给当时正苦苦追寻中国革命成功之路的孙中山先生以重大影响。

十月革命后不久，从 1918 年夏开始，孙中山即与列宁有函电来往，商讨中国革命与中苏合作问题。当时，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学说以及苏俄政府的两次对华宣言，使孙中山受到

了极大鼓舞。

1920 年秋，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提出建议：同苏俄建立电台联络，希望苏俄提供军事援助，并表示了将“华南斗争与遥远的俄国斗争结合起来”的愿望。

1921 年 8 月，孙中山在一封写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说：“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的军队和教育的组织。”

同年底，孙中山在桂林大本营同共产国际的另一位代表马林会晤，马林向他提出两条建议：一要建立有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政党，二要开办军官学校，培训一支革命军队的骨干力量。这些建议，都得到了孙中山的赞赏。

1922 年 4 月，孙中山又在广州与少共国际代表达林进行会晤和商谈，双方达成了不少共识。

通过接二连三的会晤，孙中山进一步加深了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认识，逐步坚定了联俄的决心与信心。

与此同时，苏俄对孙中山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并决心给他提供更多的帮助。

1922 年 8 月，苏俄政府特使越飞到达北京，孙中山先是与越飞进行多次通信联系，后于 1923 年 1 月在上海会见越飞。不久，二人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公开表达了孙中山酝酿已久的联俄政策。

1923 年 8 月，孙中山委派了以蒋介石为首且有共产党人张太雷等参加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党、政、军组织情况。

同年 10 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俄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同时给予孙中山的广州政府以军事和物资援助。

鲍罗廷是一个富有政治经验和组织才能的人，他的到来，使孙中山欣喜兴奋不已。孙中山聘请他担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参

加并指导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后又聘他为国民政府首席政治顾问。

正是在上述频繁接触与了解不断加深的基础上，孙中山的思想产生了飞跃，他在 1923 年底给蒋介石的信中曾斩钉截铁地说：“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①

由此可见，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这次革命，不仅催生了崭新的中国共产党，而且使孙中山及国民党也发生了十分重大的变化，并最终促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

1925 年秋成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正是在上述背景与基础上诞生的，它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产物之一。因此，这所大学才会以孙中山的名字出现。

然而，尽管这所学校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但其招生的对象并不仅限于国民党人，而是包括更多的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学生。可以说，中山大学是为当时国共合作的中国大革命培养政治理论骨干的特殊学校。

因此，许多有志于为中国革命而努力奋斗的人们，都把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视为一次难得的机遇，纷纷报名前往。

一、红色莫斯科：群英荟萃

当鲍罗廷正式宣布中山大学成立后不久，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立即成立了以鲍罗廷为顾问，由汪精卫、谭延闿、古应芬组成的选拔委员会，决定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地通过考试选拔学生。

由于军阀割据的时势，使中山大学的招生方式显得很与众不同

^① 黄季陆：《划时代的民国十三年》，转引自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9 页。

不同。当时，只有广州处于国共两党的完全控制之下，属于中国革命的中心，因此，公开招考的办法也只能在广州顺利进行。中山大学第一次在广州招收的 147 名学生，就是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从 1030 名考生中录取的。

在广州之外的其他几处招生点，只能采取由组织上秘密推荐的方式选派，而这项工作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完成的。

与中国共产党相比，国民党在很多方面都显得有些先天不足。以组织问题为例，在国共合作前，国民党的组织只在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少数地区和海外存在，且工作大多停留在狭小的上层社会中，缺乏下层的群众工作。尽管国民党中的一些进步分子想改变这种状况，但他们对下层的群众工作并不熟悉，因而也是有心无力或力不从心。

然而，这方面的工作却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注重的，并且已经积累了初步经验。因此，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后，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纷纷在全国各地积极创立和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他们在许多处于军阀统治下的地区，对群众进行了艰苦的宣传鼓励和组织工作，把他们吸引到拥护国民革命的旗帜下来。

后来，周恩来在回顾那段历史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当时，国民党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它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央，是我们党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

周恩来的话无疑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因此，中山大学在广州以外省份的招生工作主要由中国共产党人来完成的局面之出现，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莫斯科中山大学招生的消息传出后，赴苏留学立即成为一种

时尚，很多人都想报名前往。以第一期招生为例，尽管当时只获准招生 300 余人，但仅广州一地的报名者就有 1030 人，其踊跃程度由此可见一般。

正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样，并非人人都能有机会实现奔赴“赤都”的梦想。对于那些未能获此殊荣的人来说，心中一定充满了惆怅与惋惜之情。

这也难怪当时的人们如此青睐于去中山大学留学，因为对于中国的革命者来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已经成为心中的灯塔，而莫斯科也成为人们心中神往的“圣地”。

这种情绪，不仅存在于许许多多共产党员的身上，而且在国民党人身上同样也有。这一点，从一些国民党要人纷纷把自己的子女送往俄国的做法中得到了反映。

比如，在中山大学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学生名单中，就有如下一些人的名字：

蒋介石之子蒋经国；
冯玉祥之子冯洪国；
冯玉祥之女冯弗能、冯弗伐；
邵力子之子邵志刚；
叶楚傖之子叶楠；
于右任之女子秀芝。

当然，与一般人不同，这批国民党要人的子女都是以“保送”的方式被送进中山大学的。与这些“幸运儿”相比，其他人则只能通过另外两种方式实现去中大的愿望：报名考试，接受选拔；或由组织上秘密推荐选派。

一方面，中山大学的招生名额毕竟有限；另一方面，想去中山大学的人数却非常之多。如此一来，当然出现了“僧多粥少”的局面。除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广州所招收的人数比较多也比较集中之外，其他省份都是很少的，一般为 10 名。

这一情况，无疑更使那些能够如愿踏进中山大学校门的人增添了几分自豪感和优越感。

“要想在中国取得革命的成功，就必须向苏俄学习，而要向苏俄学习，最好的途径当然是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这似乎是当时许多中国革命青年的共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人都无法按照这一逻辑继续走下去。因此，从表面上看，历史在这里似乎给革命者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同样都是热情满怀的革命青年，却无法拥有相同的革命机会。

这当然只是一种肤浅的、简单化的观念，只有纯粹属于书斋中的革命者才会把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如此绝对化。事实上，只要是一个真心想参加革命的真正革命者，其革命的机会是无处不在的，革命的道路也是有很多条的，正如“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样，“条条大路通革命”也是确定无疑的。也就是说，不同的人皆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走进革命的门槛。

然而，可惜的是，并非人人都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否则的话，也就不会发生本书中所讲的那么多也许不该发生的故事了。

历史并没有存心要跟人们开玩笑，只是人们自己想跟自己开玩笑而已。

从 1925 年开始，到 1929 年，每年都有一批人由中国远涉重洋，辗转赶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几年里，莫斯科成为当时中国的革命精英荟萃的地方。

但是，从 1930 年开始，便不再有中国青年进入中山大学了，因为在那一年里中山大学宣布停办。

从创办到停办，中山大学只经历了短短五个春秋，这对中国革命而言，究竟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不幸？答案只能在以后的历史中去追寻和求解。

应该指出的一点是，尽管中山大学在其存在的 5 年中共招收了 4 期学生，但这 4 期学生的成份却并不相同：后两期与前两期

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进入中山大学的学生，除有一少部分来自国外的华人和在法国等西欧国家中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外，绝大多数来自国内。来自国内的学生，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招收了两期。这两期学生，名义上是由国民党选派，而实际上则是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别选派的。在共产党选派的学生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而国民党在广州录取的学生中则有很大一部分是国民党员。

另外，中山大学前两期招收的学生，在社会出身方面并没有具体和明确的规定，而且实际招收的学生中知识分子出身的占了大多数。

以第一期在广州招收的学生为例；在 147 人中，学界 55 人，教育界 7 人，报界 2 人，农界 1 人，其他 7 人，未详 10 人。^①

从第三期开始，中山大学在国内的招生发生重大变化。变化的起因，即在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不仅与共产党分道扬镳，而且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国共两党关系彻底破裂。

1927 年 7 月 26 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取缔”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同时命令各级组织严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学生。

国民党居然倒行逆施，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抛弃了中山大学，这无疑给苏联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也令苏共感到气愤。然而，苏联人并没有立即更改中山大学的校名——也许，苏联人根本没有预料到中国的革命形势会在短期内发生如此大的逆转，因而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感到震惊异常，没有来得及考虑更改校名这样的事。

当然，也许有其他更多的原因。

① 子任：《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直到 1928 年，“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才更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这个名字一直延用到 1930 年秋学校停办。

在学校易名以后，尽管人们在习惯上仍然称之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或“中山大学”，但此“中大”已非彼“中大”，这不仅仅是改了一个校名而已，更重要的是学校招生的对象也与以前大大不同。

此后，进入中山大学的学生，全都由共产党在各地秘密选派。中山大学的办学宗旨，也由为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培养人才，转变为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培养政治骨干和理论人才。

这样，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山大学在办学宗旨、招生条件以及课程设置方面，都有了一些重大的改变。而且，明确提出要把中山大学改变成为共产主义高等学府，因此它实际上成了一所为中国革命培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干部的高级党校。

从第三期开始，学校提出如下一些新的招生条件：

学生的组成，最好有从事过革命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不少于一半，非党群众占少数，共青团员占三分之一左右——实际上，由于招生是在蒋介石集团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进行的，所以实际招收的学生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在学生的社会出身方面，学校提出的要求是：产业工人不得少于一半，其余是农民、城市贫民和知识分子。

对于从侨居海外的中国人中招生的条件，学校作出的规定是：只招收有工龄的，而且主要是来自有文化的工人中间的党员和团员。此外，还定出一个重要候补条件：离开中国不得超过 5 年。

从上述规定中不难看出，中山大学的招生存在注重工人出身的倾向，而之所以会如此，无疑与当时的苏共尤其是斯大林过分

强调工人成份的思想密切相关。

以后的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对中国的革命事业的弊远大于利，显然走上了一条极端化的道路。

可是，当时人们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这又一次向人们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历史上的许多悲剧之所以发生，就是在于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完全意识到它们是一场悲剧，而且也没有看到引发悲剧的诱因。

在当时许多身经其事的人看来，作出上述种种规定，不仅是应该的，而且也是必须的，因为这些规定有利于纯洁和净化学校的思想空气。

中山大学在提出新的招生条件的同时，学制与课程设置也予以调整。从 1927 年起，学制改为 3 年，所修的课程具体包括：俄语、社会形势发展史、联共党史、西方革命史、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党的建设、军事、工厂劳动实习。

平心而论，建立中山大学的初衷无疑是好的，因为它是一所为中国革命培养政治理论骨干的学校——先是为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又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之所以对这所学校予以很大的重视，也是因为它具有这样的性质。

大革命失败后，中山大学所做的一切改革无疑都是围绕着实现上述目的而展开的。然而，好的目的和愿望，是否一定会产生好的结果呢？

事实证明并非尽然如此。

当时，许多赶赴中山大学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也是抱着一颗为中国革命事业而奋斗的赤诚之心而万里迢迢前往的。正是由于受这种发自内心的巨大精神力量的鼓舞和支配，所以他们才会不畏艰难险阻而远赴异国他乡，负笈域外。

据在大革命失败后被秘密选送去中山大学学习的陈修良（陈

逸)回忆,当时赴苏留学的确是一次充满惊险和艰辛的“旅行”。

她在回忆中说道:

“我们这一批去苏联的同学大约有 200 人左右……全体同学绝大多数是党员,少数是团员,个别的不是党、团员。从外地来的多住在旅馆里(指上海的旅馆,当时赴苏留学的人都要到上海集结出发——引者注),由小组分头联络,我们怕发生意外,经常讨论组织纪律与生活问题。在上海等了一个多月,幸而没有出事。这批同志大抵是从武汉撤退的,还有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撤出去的一些干部。有时我们也讨论一些政治问题,研究武汉政府的失败原因,但都不明确,得不出结论。唯一能够算是统一的意见,恐怕是我们都不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失败,更不认为革命已经转入低潮。我们认为革命暂时失败,胜利很快就要到来。我们只知道失败是因为国民党叛变国民革命,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叛变工农而失败,至于主观原因是什么,那时还很不清楚,也没有人告诉我们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

正是在这种既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又对革命道路充满困惑的心情中,陈修良等人踏上了奔赴莫斯科的征程。

陈修良继续回忆道:

“我们抱着探求真理的愿望登上了苏联的货轮。这条停泊在吴淞口外的货轮名叫‘安铁捷’。我们必须坐小舢板到吴淞口外才能上船。开船时间定在夜间,这一夜真是十分惊险。我们这许多人分别雇了小舢板去吴淞口外,我们担心很有可能要引起敌人的注意,岂不要同归于尽,好在黄浦江上船舶多,来往客人拥挤,我们三五成群分乘小船而去,却也无人过问,便登上了苏联货轮。支部委员首先上去,等候大家的到来,这时我才见到莫斯

科中山大学派来招生的一位俄国人，名叫阿伯拉姆松，他们夫妇两人已经到了船上迎接我们。他会讲北京话，要我们都住在下面船舱去。我按着名单一个个点名，没有失落的，这才放了心。所有的人都挤在大舱里，不分男女睡在一起，我被挤进一间机房里，满身大汗地检点人数，担心海关人员前来查问。后来海关人员真的来查货了，出来接待的是一个俄国海员，他们说没有什么违禁东西，让他们去检查。海关人员看到这许多青年男女，有点惊奇，不过他们也不问这是一些什么人，就匆匆而去。船开出了吴淞口，就再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平安地直驶海参崴。船行三天，有时遇上大风浪，晕船的很多。我们吃的东西很简单，面包、开水、粥、饭、咸菜之类。大风大浪把我们这一群青年人送到了海参崴，什么疲倦与恐怖都抛在九霄云外了。

“在海参崴上了岸，我们被带到一个大旅馆居住，还是睡在地铺上，也没有食堂，大家吃面包、香肠之类的东西，有时也吃红菜汤。当时海参崴的市容不好，破破烂烂，很少见到新造的房子，旅馆都是旧俄时代留下来的，家具也很破旧。后来我们搬到山上几个旅舍中去住，情况也差不多……”

“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节，我们在西伯利亚火车上度过，大家还唱歌，表示庆祝，车上有俄国工人一齐来参加，非常高兴。西伯利亚早已白雪皑皑，望不尽的大森林。在冰天雪地里火车奔驰了 12 天，好容易才到达莫斯科，这里的风景与远东大不相同，是欧洲文明的地区。我们注视着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社会和人民的生活，欣赏欧洲文明，回想苦难的祖国，我们下定决心要学好革命的理论，为祖国的解放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①

毋庸置疑，尽管奔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一条极为艰险的路，但对于大多数选择这条道路的革命青年而言，他们并不在乎这些

陈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参见前书，第 47—49 页。

危险和艰难，和陈修良一样，他们在乎的是“要学好革命的理论，为祖国的解放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

苏联政府无疑是欢迎他们的，也为他们提供了不少方便。中山大学学生在苏联留学期间的全部费用，都由苏联方面承担，每人每月发给 20 卢布的津贴费，衣服及日用品、洗澡、洗衣、理发、医药费等，均由学校供给，而且回国时还支付一笔美金，当翻译者或有行政职务者另有工资。

在中山大学里的中国学生，生活的确是相当舒服的。

然而，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假如每个人都抱着同样善良或至少是差不多善良的愿望与想法来做事的话，那么，可以想见，中山大学里应该能够培养出一批有益于中国革命的人才的。

但事实上，这似乎只是人类“可欲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状态。

人与人是不一样的，人与人的想法也是不一样的，正如哲人们所言：“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同样地，社会上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

从中山大学初创时起，陆陆续续进入该校的人不下 1000 多名，在如此众多的人中，形形色色都有。

对此，陈修良也曾回忆说：

“1927 年至 1928 年陆续从国内外到苏联去的中国同学文化程度悬殊、成份、经历不同，政治思想也十分复杂。这样五湖四海的人凑在一起，矛盾在所难免。”^①

实际上，她所说的情况，在中山大学每一期招收的学生中都存在着。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以才使得人们的愿望与现实、初衷与

陈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斗争》，第 51 页。

结果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差。

这正象陈修良感叹的那样：

“我们满想在‘社会主义的祖国’，好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更好地为中国革命努力工作，有谁想到这个平静学府里的风浪，比太平洋上的台风还要强烈。从上面刮起来的阶级斗争之风，对中国革命起了不能估量的波动。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问题也产生在这里，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的后果，在中共党史上占了不能磨灭的篇章。”^①

二、年轻的俄国老师和他的得意中国门生

中山大学位于莫斯科近郊的沃尔汉克大街 16 号，后来成为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办公大楼。

这里原是旧俄时代一个大资本家的别墅，一幢四层的大楼房，楼前是一个大花园，面对莫斯科大教堂，可谓环境优雅，令每一位留学生都有心旷神怡之感。

由于中山大学本身所肩负的特殊使命，所以该校的教员几乎都是俄国人，学生都是中国人。这一独具的特色使它在莫斯科显得十分与众不同。

在 1925 年最初招生的时候，中山大学即形成了一项制度：凡人校学习的学生都有一个学生证，学生证中的名字不用中文，而是用俄国名字。

第一期入学的 300 多名学生的名单中，有一个名叫“克劳白夫”的人。在俄语里，“克劳白夫”的意思是“鸟”，并不很适合用于人名，但不知此人为何看中了这几个字，也许是梦想自己有一天也能像鸟那样肩生双翅，凌空翱翔吧。

陈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斗争》，第 53—54 页。

这个“克劳白夫”，不是别人，正是后来中共党史上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王明。

王明，1904年生于安徽省金寨县，自小家境贫寒，但却头脑聪慧，机警异常。他6岁入私塾，8岁能写对联，9岁会写诗，可见其才智颇为超群。

王明能够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一员，既不是通过保送的方式，也不是通过公开招考的方式和秘密推荐的方式，而是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和一种特殊的机缘达到的。

赴苏留学之前，王明是武汉商科大学的学生，并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商大里是一名活跃分子，既能写一手不错的好文章，又很积极地投身于多次政治活动。然而，湖北省所派选的10名赴苏留学的学生中，却没有他的大名。这当然主要是由于名额有限的缘故。

然而，从小就一直有争强好胜之心的王明却无法接受这种结果，更不愿放过这次出国深造的绝佳机会。

于是，他独身一人开始了争取去苏留学的奔波。

既然湖北没有名额，王明就跑到南昌，找到了他在商大时的入党介绍人许凌青，希望许能让他占江西的名额去苏留学。但不巧得很，江西分配的名额已满，王明只好又直接来到负责接受学生去俄国的上海，先是找到了在上海的湖北省党部负责人，后又找到了专门负责办理去苏留学的江苏省国民党党部的秘书长姜长林。

湖北省的负责人见王明去意坚定，且不辞劳苦地多次奔波，也很想满足他的愿望，便去找姜长林替他通融。但姜长林坚持已经分配好的名额不能突破，没有空额王明就不能去苏留学。

情急之下，王明想出了一个自认为很绝的高招，他亲自跑到江苏省国民党党部去找姜长林争吵，并威胁道：

“你们不要我去，我就报告巡捕房，大家都去不成。”

没想到，姜长林比他还要棋高一着，面对这位不顾组织原则的青年，他同样还以颜色回答道：

“你报告去好了，这样帝国主义会对你更严厉！”

王明还是嫩了点，他不知所措地问道：

“这是为什么？”

姜长林又答：

“我不去苏联，不害怕。你要去苏，帝国主义就会抓你。”

事隔 60 余年后，据姜长林回忆说：王明听完他的话，就“不吱声了”。^①

对于王明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言语，姜长林向中共江浙区委做了通报，区委也同意不能突破名额让他去苏留学。

但王明仍然没有死心，还是三番五次去找姜长林，“开始是吵闹，然后是哭泣，最后是恳切要求”。^②硬的不行就来软的，王明的心性和头脑的确非同一般。

“苦心人，天不负”，也许王明的软磨硬泡真的感动了上天。最后，中共江浙区委和姜长林商量，如果别的省有空缺名额，就考虑让他去。姜长林经过一番查找，结果发现正好有空缺。

于是，王明的愿望实现了。

这个偶然的成功，对王明来说可谓意义重大，不仅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也产生了事关全局的重要影响。

1925 年 11 月 28 日，王明同俞秀松、董亦湘、张闻天、乌兰夫、王稼祥、吴亮平、伍修权、孙冶方、沈泽民、张琴秋、李培之等 60 余人，一同在大雪纷飞中来到了莫斯科。

王明出国留学的道路，的确比其他人都要曲折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或许也预示着他将很多方面与众不同。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年版，第 57 页。
同上书。

只不过，与众不同的表现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好的形式表现出与众不同，一种是以坏的方式表现出与众不同。王明究竟属于哪一种呢？

这当然要看王明自己的选择了。

从王明的本性来讲，他也是很想与众不同的。从私塾到小学，从小学到中专，从中专到大学，王明的学习成绩一直都不错，常常名列前茅，因而他的心性奇高，“出人头地”似乎已经成为他头脑中的固有之物。

可是，20岁刚出头的王明，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学校中度过的，他既没有参加实际斗争和工作的机会，也没有这种愿望，在他的思想观念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意识更为根深蒂固，他似乎已经把读书视为世上最高贵的事情——否则的话，赴苏留学对他的吸引力也不会如此之大。

因此，对于王明而言，若想出人头地，最好的途径莫过于读书。这是他自认为最明智的选择。

人们常说，想成名、出名的人，往往对自己的名字也格外注意，倾注了很大的热情，这一点，在王明的身上确实得到了验证和明确的体现。

其实，王明本来并不姓王，而是姓陈，他的真实姓名是陈绍禹，直到踏进中山大学的门槛之前，他都是以“陈绍禹”的名字出现在人们面前的。

进入中山大学后，陈绍禹才有了俄文化名克劳白夫，此后几年中乃至以后更长的时间里，他曾经使用过很多名字，其中中文名字有：韶玉、慕石、兆雨、诏玉、绍玉、玉石等等笔名，泰山、风康、石、绍虞、WM 等等化名；俄文名字则还有波波维奇、马马维奇等。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中的许多人尤其是一些重要领导人，都曾经使用过不同的笔名

或化名，这本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像王明这样拥有如此之多的化名和笔名的人，却殊为罕见。

可以说，他的名字就像他的思想一样变幻多端。

“王明”这个名字，是陈绍禹 1931 年到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开始使用的化名。按理说，在叙述此人 1931 年前的情况时，本不应用“王明”，但为了叙述的方便和因应读者的习惯，本书中一律使用王明。这个名字，是他一生中使用时间最长的一个，而且他也是以此名而流传于世的。

和王明一起进入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中，绝大部分都不懂俄语，而那些俄国教员们也不懂汉语，当时的翻译又很少。因此，学生们入学后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语言不通，而语言问题又影响教学。

为了解决语言不通的难题，校方采取了许多措施，加速培养翻译人员。一方面，学校把第一期学生安排到俄国居民家里实行一段时间的“三同”——同吃、同住、同学习；另一方面，又把俄语学得好的十几个人编成一个俄文班，由教员直接用俄语授课，以期培养“速成翻译”。

王明的一大特长，就是能记能背，而这一点恰恰是学会语言的必备前提。由于他的俄语水平提高得很快，所以当俄文班成立时，他便与俞秀松、董亦湘、刘少文、西门宗华、庄东晓、李培之等人一起被选进俄文班中参加学习。

这件事，对王明来说的确是一次莫大的机遇。

不可否认，王明是一个很自负的人，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很聪明机灵的人。对此，很多人都承认，当然王明自己更是在心中默认为的。能够体现王明的聪明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他十分善于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场合下寻找机会、发现机会，并利用机会。

在王明的早期生涯中，他的这一特长被反复发挥和利用出